

七七事变后的琼崖抗日救亡 众志成城保家乡

■ 张兴吉 王磊晶



琼崖抗日先锋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抗日战争进入全民族抗战阶段。在此阶段，无论是中国方面，还是日本方面，对于这场战争的发生与发展都有所预测，也有所准备。即使事变发生在中国的北方，远在南海之滨的琼崖军民，对于即将开始的全面抗战，也有所认识，大家积极开展抗日宣传活动，形成共识。

尤其是从1938年下半年开始，日军飞机不断袭扰甚至轰炸海南的城镇，进一步推动了琼崖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琼崖有关方面进行部署，防御日寇入侵海南。

构筑防空洞壕、储备弹药、药品等物资

自近代以来，随着日本国力的增强，其觊觎东亚大陆的野心开始逐渐显露。早在清末，日本方面就已在东亚大陆特别是中国，开展军事侦察活动，并不断强化。1939年2月日军入侵海南前，其对海南岛的觊觎和袭扰早已存在。

1937年，日本设立了兵部省海军部水路局（今日本海上保安厅水路部），负责对海洋的观测与侦察。此局后改为日本海军省水路部，自1894年开始编制的《中国海水路志》，其第6卷下（1902年编制）中就有“第七编：海南岛及海峡、海南海峡”等内容；进入民国时期，中日关系变得更加紧张，日本对华的情报工作进一步加强，这一时期日本驻广州领事馆成为其搜集海南岛情报的一个主要支点。现存于日本公文书馆的档案中，有1932年该领事馆上呈给日本海军省次长的情报“粤情报第十号（1932年6月13日）琼崖红军的现状”。民国时期陈铭枢主编的海南地方志《海南岛志》，极受日本官方重视，日本在台湾的殖民机构——台湾总督府责成相关机构组织力量进行翻印，先后四次印刷出版。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开始更全面地搜集海南岛的情报，特别是关于军事力量的情报。比如，日军第五舰队司令部编制的《第五舰队：关于海南岛的综合敌情》（1939年1月31日），这份情报分为三个部分，分别记述了整个海南岛及今海口、三亚地区的中国军事力量与分布情况，情报来源是日本驻香港总领事馆。从该文件可以看出，日军已得知驻海南岛的国民党军第62军152师于1938年11月23日、24日全部渡海离开海南岛。日本驻香港总领事提供给第五舰队的海南岛内武装力量情报更加详细，提到海南岛内仅有保安第五旅王毅所部2个团，第1团900人，第2团700人，新编守备团7个大队，每个大队约250人，共约1750人，秀英炮台驻兵250人；另

有冯白驹领导的独立大队300人。

1936年北海事件（日本商人在广西北海被杀）发生后，日军的军舰、飞机不断在海南岛北部海域活动。为了应对这种变化，南京国民政府在处理完两广事变后，开始着手应对可能发生的日军侵琼情况。1936年9月，接替陈济棠担任第四路军总司令兼广东绥靖主任的余汉谋，开始改编广东省内的军队，编为10个师，2个独立旅，后将152师陈章部调到海南岛，增加琼崖防御力量。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余汉谋又将广东军队扩编为5个军，其中的第62军军长张达所部，下辖驻扎海南岛的152师。1938年9月，张达兼任广东省第九区行政督察专员及琼崖保安司令，王毅任副司令兼广东省保安第五旅旅长。国民党琼崖当局开始在海口、榆林等地构筑防御工事，派兵驻守，同时在定安县第四区南间、乌坡、岭门等地修筑仓库，储备弹药、药品、米、盐等物资，做好持久抗战的准备。

七七事变后，日军多次从空中袭扰海南的城镇。国民党琼崖当局也有一些应对措施，比如在各处设置防空监视哨，进行防空训练，特别是在今海口地区安装防空警报器，构筑防空洞壕，并进行巷战演习。国民党琼崖当局还委派琼崖民众运动处的数十名干部，分赴海南各县，协同各县政府、国民党党部，组织训练民众，增强备战警觉，告知民众一旦日军人侵相机破坏公路、桥梁等。

1938年11月，张达及第62军被调往广东东江地区后，王毅成为当时国民党海南防务的最高负责人，随后琼崖守备司令部成立，王毅任守备司令兼行署专员。王毅上任后，在公开演讲中旗帜鲜明地表示：“我们为什么要奋起抗战？是为了保住琼崖，为了保卫国土，为了驱逐日寇出中国。”他提出要抗战就不分党派，联合友党友军，一致对外，其“屈服必亡，唯战能存”的主张成为琼崖抗战前期的标志性口号。

铭记历史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特别报道

缅怀先烈 80周年特别报道

学 生 声 援 抗 日，工 人 自 发 成 立 救 国 会

进入1938年，海南各地中小学的师生在日军的轰炸威胁中，更加积极地行动起来，利用各类刊物进行抗日宣传，并以宣传动员为基础，组建抗日后援会、学生自治会、同工会、教师会、前哨社等抗日组织。这些抗日组织，获得地方政府备案认可，影响力较大。在一些主要城市，工人们自发成立工人救国会，配合学生的抗日宣传活动。工人、学生等社会群体加入，走上街头参加抗日活动，进一步壮大了琼崖抗日救亡运动的声势，全岛涌现多支抗日救亡宣传队。

在海南商界，抗日救亡运动迅猛开展，大量抗战书籍在社会上流传。据日本随军记者火野苇平在《海南岛记》中说，日军占领海口后，“对海口市内的书局进行了全面的调查，虽然各书局都出售抗日的书籍，但只有同光书局完全贩卖有关共产主义和抗日的书籍”，由此可见当时抗日救亡运动的普及程度。当时海南岛上最大的书店——海南书局，也大量出售有关抗日的书籍和报刊。因此，海南书局被日本人认为是“抗日核心分子所经营的敌产”，其店主唐品三也被认为是海口市的抗日领袖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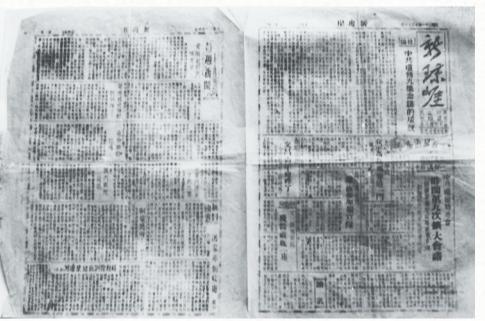


海南书局旧址。抗战时期，该书局曾出售抗日主题书籍、报刊。

从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到1939年2月日军登陆海南岛，琼崖各界积极开展抗日宣传，参与抗日救亡运动，形成了全民族抗战的共识，也在防御日军侵琼方面做了一些准备。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日军入侵海南岛后，琼崖各界人士勇敢地与侵略者斗争，打击了侵略者的嚣张气焰。在孤立少援的情况下，海南军民坚持抗战6年半，最终迎来了抗战胜利！



创办于文昌的抗战杂志《前哨》。



抗战时期的《新琼崖》报。



位于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和平镇乘坡河畔的“唯战能存”石刻。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为资料图

↓ 卢沟桥。新华社发



琼崖国共谈判——

从分歧到握手

■ 张兴吉 王磊晶

琼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既受到国内全面抗战局势的影响，也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谈判过程。

1935年8月，中共中央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八一宣言》），但当时中共琼崖特委与中共中央的联络中断。后来，琼崖特委从华侨带回的报纸上了解到《八一宣言》的内容，开始向海南各地传达党中央的政治主张，提出“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救国救琼”等主张。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中共琼崖特委根据党中央及中共南委的指示，发表了《团结抗日，保卫琼崖》的告同胞书，同时主动与琼崖国民党当局联系，提出停止内战、团结抗日，表示愿将琼崖红军改编为抗日部队，建议双方派代表进行谈判。

从1937年8月至1938年10月，琼崖国共双方代表进行了长达1年3个月的艰苦谈判，谈判的核心是琼崖红军的改编问题。在最初阶段，琼崖特委派出乐东县委书记黎民为代表，前往府城同国民党当局派出的代表152师政训处主任林序东谈判。双方谈得并不顺利，国民党方面提出诸多无理要求，要冯白驹把红军完全交出编入国民党部队。遭我方拒绝后，国民党琼崖当局便扣押了冯白驹，后经周恩来、叶剑英等人交涉，加之岛内外各界人士抗议，国民党琼崖当局才释放了冯白驹。

1938年6月武汉会战打响，余汉谋所部广东东军队半数被抽调去武汉抗日，导致广东的守备兵力严重不足。10月，为了策应武汉作战的日军部队，切断中国的海上联络线，日军第21军突然南下，并在广东登陆，于21日攻陷了广州。武汉会战开始前，因广东兵力不足，当时驻海南岛的国民党军第62军152师（总计约1.5万人）在余汉谋命令下，开始分批撤离海南，至1938年11月全部撤走。彼时，除了琼崖红军，海南岛上的守军仅有一些地方部队和刚组建的常备队，合计不过4000人。

进入1938年，日军不断派飞机轰炸海南岛北部的海口、琼山等地，日军军舰在海南岛南部的榆林港海域活动，局势空前危急。严峻的形势，迫使琼崖国民党当局必须改变原来的想法。在冯白驹与王毅最后的谈判中，王毅在琼崖红军改编问题上，同意了中共琼崖特委的原则性要求，比如琼崖红军改编为抗日部队后，保持相对独立等。1938年10月22日，琼崖国共双方达成了团结抗战协议，标志着琼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建立。

1938年12月5日，在琼山县云龙镇（今海口市琼山区云龙镇），琼崖红军正式改编为“广东民众抗日自卫团第十四区独立队”（简称琼崖抗日独立队）。从全国视野看，此次改编虽然只是局部的改编，但受到国内外各界人士的关注。1938年11月28日，《大公报》以《增加抗战力量，琼崖红军接受改编》为题，对琼崖国共合作的实现进行了报道；12月13日，《上海日报》刊登文章《国共合作史之一页：琼崖红军慷慨受编记》，给予琼崖红军改编很高的历史评价。从此，独立队在中共琼崖特委的领导下，采取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方针，独立自主地发展壮大自己，发动群众，团结各界爱国人士，开展敌后游击战争，成为琼崖抗日先锋和中流砥柱。